

古树名木是自然与人类文明共同孕育的宝贵遗产，具备自然与文化双重属性，是文脉传承的重要载体。曲阜“三孔”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其古树名木群落与孔庙、孔林、孔府的古建筑、石刻、墓葬等文物资源深度共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景观。自孔子亲手栽植“手植桧”始，历代围绕古树开展的讲学、祭祀、植树等活动，使树木逐渐从自然植被升华为儒家思想的精神象征，一些代表性树木承载着“君子之德”“诗礼传家”“尊师重教”等核心文化内涵。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系列文件，强调要加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古树名木的保护与阐释工作。曲阜“三孔”古树名木的价值挖掘与转化不仅关乎单一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更对儒家文化的现代表达、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本文基于“三孔”古树名木的资源现状与保护实践，系统阐释其时代价值，探索科学有效的转化路径，为同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借鉴。

曲阜儒家文化遗产古树名木的资源禀赋与历史脉络

曲阜13处国保单位现存古树名木约2万株，分属18科30种，其中“三孔”区域集中分布逾万株，以柏树为优势树种，多类型树木共生，生态、人文价值突出。“三孔”景观植物形成了差异化的植被群落特征：孔庙、孔府以高大乔木为主，凸显礼制空间的庄严肃穆；孔林则呈现乔木、灌木、藤本、草本共生的完整生态系统。在等级构成上，“三孔”一级古树（树龄≥500年）数百株，涵盖圆柏、侧柏、黄连木、国槐、银杏、蜡梅等多个树种，其中千年以上树龄数十株，最高树龄估测近两千年。这些古树名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三孔”的建筑格局、石刻艺术、历史档案深度耦合。如孔庙大成门旁的“孔子手植桧”是儒家标志性的文化遗存，大成殿前的汉代桧柏见证了历代祭孔大典的庄重礼制与朝代更迭的沧桑变迁，孔府花园的“柏树槐树共生现象”诠释了“和而不同”的君子人格，孔林楷（jie）树文化成为“尊师重教”的精神坐标，形成了“一树一景、一木一魂”的文化景观体系。

“三孔”古树名木的发展历程与儒家文化的传承演进同频共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起源奠基期（东周至魏晋）：孔子逝世后（公元前479年），弟子们在其墓旁筑坟植树，开启了孔林植树的先河。孔子推崇松柏“傲寒不凋”的君子品格，亲手栽植的“手植桧”成为儒家文化的最早物质载体。这一时期，古树栽植主要围绕祭祀活动展开，数量有限但象征意义深远，奠定了儒家将树木的自然特性与人的道德品质进行类比的文化传统。发展壮大期（唐宋至明清）：随着孔子地位的提升与“衍圣公”封号的世袭传承，“三孔”古树栽植规模不断扩大。唐宋时期，孔庙扩建同步补植松柏、银杏等树种；明清两代，帝王频繁亲临祭祀，带动了皇亲国戚、文人墨客参与植树赠树，孔林逐渐形成规模宏大的家族墓地园林，古树种类与数量大幅增长。这一时期，古树名木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形成了与儒家核心思想对应的符号体系，如诗礼堂银杏树与“诗礼传家”家训的结合，奎文阁“龙凤柏”与吉祥文化的融合。保护传承期（近现代至今）：1961年“三孔”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古树名木保护进入规范化轨道。20世纪50年代以来完成了3次古树普查，并逐渐构建了专业的保护管理体系。近年来，通过基因保护、文化赋能等创新举措，古树名木保护从单纯的生态守护转向“基因传承+文化传播”的多元发展模式，实现了活态传承的历史性跨越。

儒家文化遗产古树名木的时代价值维度

精神象征价值。“三孔”古树名木承载着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象征。“先师手植桧”历经两千余年沧桑更迭，被视为儒家思想生命力的象征，其坚韧不拔的生长状态隐喻着儒家文化“斯文在兹”的传承韧性。孔子以松柏喻君子，“三孔”柏树成为“刚毅坚卓”人格的具象化表达。众多古树名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精神符号体系：孔府“柏树槐树共生现象”侧柏五个枝干环抱一槐的生长形态，诠释了儒家“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包容思想；孔林黄连木“干直疏而不屈”的特征，对应着“直道而行”的君子品格，与周公墓“模树”并称“楷模”，成为“尊师重道”的文化象征；诗礼堂宋代银杏树雌雄共生的特性，既承载着“诗礼传家”的家训文化，又延伸出家庭和睦、文化传承的当代寓意。这些精神内涵通过古树的物质形态得以具象化，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可感知、可认同的价值标杆。

文化传承价值。古树名木是儒家文化传承的见证者，儒家文明的活态记忆库，其生长历程与历代文化活动相互交织，形成了丰富的



孔林宋代石人翁仲像



孔子故宅（诗礼堂）

儒家文化遗产古树名木的时代价值挖掘与转化

——以曲阜“三孔”文物景区为例

曹胜磊



国保单位·古树名木

史文化积淀。历史上，多位帝王亲临曲阜祭祀孔子，无数文人墨客围绕“三孔”古树留下赞诗、典故、碑刻。这些文化遗存与古树相互印证，构成了立体的文化记忆体系。古树名木的文化传承价值还体现在其与儒家礼仪、教育、家风等文化形态的深度绑定。诗礼堂院古银杏树成为孔氏家族“诗礼传家”的活态见证，“子贡手植楷”源于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的典故，孔林黄连木成为“尊师重教”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孔庙众多古树见证了历代科举、讲学等教育活动，成为儒家教育文化的实物遗存。通过这些古树名木，儒家文化的核心要素得以代代相传，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文化纽带。

生态示范价值。“三孔”古树名木群落历经两千余年保护传承，形成了稳定的生态系统，展现了儒家“天人感应”与“天人一也”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孔林规模宏大，孕育了数百种植物、昆虫及野生动物，构成了完整的生态链，成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树名木作为生态廊道的核心节点，在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三孔”古树名木的保护实践，深刻印证了文化景观对文化传承的核心价值与关键意义。对古树的敬畏与守护，并非单纯的生态保护，而是将自然植被纳入儒家文化的价值体系。这种将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相结合的做法，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证明了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对现代社会的指导意义，为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提供了文化支撑。

文旅创新价值。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三孔”古树名木作为文旅创新的核心资源，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生态景观为文旅产品开发、文化传播提供了丰富素材。古树名木与古建筑、石刻、祭祀活动等资源组合，形成了兼具观赏性与体验性的文旅景观，如孔庙古树群与大成殿、奎文阁构成的礼制景观，孔林古树与墓葬、碑刻形成的历史探秘场景，极大提升了“三孔”景区的文化吸引力。同时，古树名木为文创产品开发提供了鲜活载体。通过符号转化与叙事创新，古树题材文创产品，将古树的自然形态与儒家文化内涵相结合，实现了儒家文化可携带、可传播的效果。此外，古树名木扩繁幼苗作为新型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其多渠道推广应用，既传播了古树种质基因，又深化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形成了文化传播新模式。

科研学术价值。“三孔”古树名木在植物学、生态学、历史学、文化学等领域具有重要科研价值。从植物学角度，古树名木是珍贵的种质资源，众多古树历经长期自然选择，具备适应环境变化的优良基因，为植物育种、物种保护提供了宝贵材料。近年来，曲阜市通过野生幼苗采集、种质资源培育、无性扩繁等技术，成功培育各类古树幼苗，为珍稀古树的基因传承提供了技术支撑。在生态学领域，“三孔”古树群落尤其是孔林的植被结构，为研究长期人工干预下植被群落的演变规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提供了典型样本。而从人文社科角度，古树名木的栽植历史、分布特征与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三孔”建筑群的演变过程密切相关，为研究历代祭祀制度、社会礼制、文化交流提供了实物佐证。同时，古树名木与儒家思想的关联研究，为探讨传统文化与自然生态的互动关系、文化符号的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案例。

结论

儒家文化遗产古树名木作为自然与人文的结晶，承载着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与历史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价值。推动儒家文化遗产古树名木的价值转化，需要以技术创新夯实保护基础，以文化赋能丰富价值表达，以机制完善凝聚保护合力，以文旅融合拓展转化场景。通过构建“基因传承—文化赋能—科技支撑—社会参与”的多元转化体系，既实现古树名木的活态保护与基因延续，又让儒家文化通过古树这一独特载体，融入现代生活、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生动范例，为文化强国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强跨学科、跨区域的研究与合作，深化对古树名木文化价值的认知，不断创新保护与转化模式，让这一跨越千年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作者单位：曲阜市文物局）



孔林之冬



孔府大堂院

鄂尔多斯高原地处黄河“几”字弯内侧，作为中国北方草原和中原的连接区域，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农牧交错共生的文化。鄂尔多斯青铜器作为这片土地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文化遗存，自19世纪末被大量发现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杭锦旗、伊金霍洛旗等多地开展发掘，出土商代晚期至汉代的兵器、工具、饰品等各类青铜器物，形成鲜明的特征。它并非单一文化的产物，而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融合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精髓，吸收中原农耕文化先进元素，形成“草原本色与中原影响共生”的独特青铜文化体系，既是解读地域文化的关键钥匙，更是印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物质见证。

空间分布与显著特征：游牧基因贯穿千年传承

鄂尔多斯青铜器呈现“核心集中、周边辐射”的分布格局，核心遗存集中于鄂尔多斯境内，辐射至内蒙古中部、陕西北部、宁夏东部等区域，出土地多沿草原廊道和水源地分布，与游牧族群活动范围、定居点高度重合。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准格尔旗西沟畔遗址等核心遗址，勾勒出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清晰轮廓，成为青铜文化演进的重要节点。

与夏商周时期的中原青铜器相比，鄂尔多斯青铜器具有显著的自身特色：一是多便于携带的日常生活实用器皿；二是以大量的动物造型为装饰题材；三是绝大多数为青铜质地，也包含部分金、银、铁等质地的器皿。鄂尔多斯青铜器贴近日常生活、生活，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和人们的观念。它与以礼器著称的中原青铜文化和以神器著称的巴蜀青铜文化等形成鲜明对比，共同构筑了多姿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华青铜文化。这正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独特魅力所在。

类型特征与典型器物：游牧农耕的实用与审美融合

与中原青铜器以礼器为核心、彰显等级秩序的特点截然不同，鄂尔多斯青铜器深深植根于游牧族群“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兼具实用性与文化性，核心品类分为五大类，均彰显浓郁的地域游牧特质。兵器类小巧轻便、实用耐用，摒弃中原兵器的烦琐装饰，兽首短剑、鸣镝等适配战争与狩猎需求；工具类与生产生活高度关联，青铜刀、凿、锥等造型简洁、便于携带，鹿首青铜刀将实用功能与图腾崇拜完美融合；饰品类是最具审美价值的品类，以动物纹为核心，搭配金、银、玉等材质，双虎咬斗纹银饰等既体现对自然的敬畏，又彰显崇尚力量的生活理念；容器类数量较少但极具特色，多为小型便携款，青铜甗、小铜杯等纹饰简洁，与中原大型器物形成鲜明对比；车马器类是游牧车马文化的重要载体，造型实用、工艺精湛，盘角羊头形辕头饰等将草原动物形象融入设计，实现功能与文化的高度统一。

鄂尔多斯境内出土的诸多青铜器物，是草原游牧文化的核心遗存，更是青铜文化的鲜活代表。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的春秋中期青铜短剑、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商代晚期青铜戈、贴合马背生活，见证了游牧族群的风俗与本地青铜工艺的起步；朱开沟遗址的青铜斧、桃红巴拉遗址的青铜锥，是游牧和农业生产生活必备工具，实用性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准格尔旗西沟畔遗址的青铜虎噬鹿饰牌，是“鄂尔多斯动物纹”的经典之作，承载着游牧族群的审美；朱开沟遗址的商代晚期青铜鼎、西沟畔遗址的战国早期青铜壶，是农牧文化交融的典范，青铜鼎借鉴中原制式并轻量化改造，融入地域特征，青铜壶融合中原传统纹饰与草原动物纹，成为文化互鉴的缩影；桃红巴拉遗址的青铜马衔，则是游牧族群车马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文化内涵与精神内核：多族群的生活与审美追求

鄂尔多斯青铜器积淀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游牧生产生活的生动写照，承载着游牧族群的精神信仰，更镌刻着草原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记。青铜器的品类、形制、功能均围绕游牧生活展开，其小巧轻便、实用易携的特征，完美适配游牧族群流动性强的特点。器物上的鹿、羊、虎等草原动物纹饰，不仅是对自然生态的真实模仿，更深刻体现出游牧族群“逐水草而居，与自然共生”的生产生活理念。青铜工具支撑生产活动，青铜兵器是生存保障，青铜容器满足饮食盛放需求，车马器支撑出行，饰品兼具装饰与身份标识功能，体现了多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内涵。

在精神信仰与价值追求层面，青铜器的纹饰与造型，是游牧族群精神世界的直观表达。草原动物被赋予特殊象征意义，虎、鹿、羊这些寓意通过器物纹饰传递，寄托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青铜器简约、务实、豪放的造型工艺，既契合游牧生活的流动性需求，也体现了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现实，深刻反映出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各族群生活与审美追求。

文化交融与双向互鉴：草原与中原的共生共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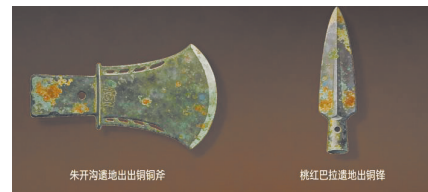
鄂尔多斯凭借草原与中原文化交界的交通枢纽位置，成为两种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节点，这一特

鄂尔多斯青铜器：草原文化瑰宝 多元一体见证

柳风



桃红巴拉遗址出土青铜短剑（内蒙古博物院、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



朱开沟遗址出土青铜斧、桃红巴拉遗址出土青铜锥（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内蒙古博物院藏）



鄂尔多斯青铜器车马器（内蒙古博物院藏）



鄂尔多斯青铜器容器（鄂尔多斯市博物院藏）

质深深嵌入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发展历程，使其成为文化交融的直接见证。在形制设计上，借鉴中原鼎、壶等经典容器造型，结合游牧需求进行缩小尺寸、简化结构等适应性改造；在纹饰创作上，中原青铜纹饰云雷纹、几何纹与北方青铜器动物纹相互融合，庄重的中原审美与鲜活的草原特色相得益彰；在铸造工艺上同样使用了中原青铜器的范铸法、镂空、浮雕工艺技术，而动物纹等元素也传入中原，实现了草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反向滋养，形成双向交流、互补共生的文化格局。

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多元一体的生动诠释

作为中国青铜文化的“一元”，鄂尔多斯青铜器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在学术研究、文化传承、文化交流等方面彰显独特意义。其一，近千年的发展序列，清晰地展现北方草原文化演变轨迹，填补了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研究的多项空白，为草原文化研究提供实物支撑；其二，器物的丰富品类、独特形制与鲜明纹饰，为研究古代鄂尔多斯地区生产生活、社会结构、精神信仰提供珍贵实物支撑；其三，作为北方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直接见证，为研究两种文化的交融历程，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重要学术支撑。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地域文化的核心载体，承载着该地区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与民族精神，兼具重要的文化传承与地域认同价值。在文化传承方面，它是鄂尔多斯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独特的造型、工艺与纹饰，让鄂尔多斯地域文化独具魅力。它更是传承游牧族群文化的重要媒介，将自然风尚、简约务实的审美追求代代相传，让后人直观感受北方游牧族群的文化，让人们对鄂尔多斯地域文化作为多元一体中的“一元”产生认同感和自豪感。依托青铜器开展的文创开发、旅游产品设计，推动传统与现代深度融合，让古老青铜在现代社会焕发新活力；而考古发掘、文物展览、学术交流等活动，也进一步普及了青铜文化知识，推动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发展历程，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拥有突出的文化价值。它始终保留草原游牧文化的核心特性，凸显北方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中原文化的先进元素，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兼容并蓄、共生共荣”的发展模式，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明体现。作为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鄂尔多斯青铜器印证了中华文明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晶，为研究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与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支撑。

鄂尔多斯青铜器是北方草原文化的璀璨瑰宝，近千年的发展历程造就了其独树一帜的文化风貌。当前，鄂尔多斯青铜器的保护、传承与研究仍面临诸多挑战，未来须持续加强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推动青铜文化与现代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当古老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不仅能为鄂尔多斯地域文化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更能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弘扬提供坚实支撑，让这份承载着草原记忆与文化交融的文化瑰宝，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绽放光彩。

（作者单位：鄂尔多斯市博物院）